

时尚小说坊 第二辑

漂浮

黄曙光 著

李心平不能活在观念世界，
也无法沉迷感官行乐，他想做真正的男人。

他源自内心的纯洁、善良在与
晓晓、梓娟、沙沙、雅雯

嬗变的情爱、婚姻中相继坍塌……

“我不得不面对我生命中的每一个女人……”

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漂浮

黄曙光 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漂浮/黄曙光著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04
ISBN 7-80640-924-6

I. 漂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2109 号

漂 浮

作者:黄曙光

责任编辑:刘磊

出版发行:海峡文艺出版社

社址: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:350001

发行部电话:0591-7536724

印刷:人民日报社福州印务中心 邮编:350001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210 千字

印张:9.375 插页:2

版次:2004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40-924-6/I·639

定价:16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前 言

我相信对世界真正的理解是从认识自我开始的。我们习惯于轻易地对世界发表评论甚至指手画脚，却往往对自己复杂诡秘的内心世界漠然置之。也许，在听到黑暗中灵魂孤独的呐喊之前，我们对世界一切自以为是的理解都是自欺欺人的谎言。自我永远是通往世界的必由之路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卢梭的《忏悔录》永远是我心中一部不朽的著作。

写作是我反省和认识自己的开始。在这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，我无法逃避地面对了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女人。她们就像一盏盏路灯，将我每一段黑暗的人生旅途照亮。女人是男人灵魂的镜子，我总是从女人身上看到了更真实更完整的自己。离开了她们，我的回忆和思考就将陷入漫无边际的黑暗之中。所以，我不得不写曾给我的生命留下不同风景的每一个女人。惟有如此，我才能触到自己神经最敏感的末梢，才能在夜深人静时窥见世界隐秘的心跳。

引 子

水边的女子
你的身影在我心底荡漾
我听见你忧伤的歌唱
却无法
将你片刻挽留

你要去哪儿
是否沿着我流淌的方向
我吻着你踏水而过的脚印
寂寞地怀想你
映在水中的容颜

.....

——献给 L·X



和绝大多数成年人一样，我曾填过无数张履历表。每次填表，1978 都成为我笔下最庄严的数字。每当写下这一数字，我的脑海里便立即浮现出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。

那天早饭后，父亲递给母亲五角钱，母亲小心翼翼地把钱揣在我兜里，又反复叮咛多次。之后，我便独自一人，迈出低矮的茅屋棚，走下门前的小山坡，穿过几块金黄的稻田，来到生产队一座较大的院落前。我静静地守在路口，等候更大的学生娃带我到大队小学去报名念书。那一年我七岁。

于是，在后来所有的履历表中，1978 就成了我人生历程的起点，仿佛此前我所有的岁月都是一片空白。然而，对于我来说，1978 不是起点，而仅仅是一次重要的延续。可以说，我童年最重要的经历发生在 1978 年之前，而不是之后。时至今日，我的梦依然常常在 1978 以前的背景上展开。无论成功与失败，幸福与痛苦，似乎都与童年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也许，人生的内容大致相同，无外乎得失成败，悲欢离合。不同的只是人生的态度和感受人生的方式。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童年的经历。所谓三岁看大，七岁看

老，也许就是这个道理。三岁之前我的生命中到底有哪些重要事件，自然已无从清理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我关于童年最早的记忆与文革有关，就像一张陈旧的底片，只要对着阳光，便可看见模糊的影子。那年正月，母亲带我到外婆家去，路过区（现在又改称镇）上中学时，我看到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整个操场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人，密密麻麻的。我仿佛突然钻进了密不透风的高粱地，很快就迷失了方向，心头不断掠过一丝丝恐惧。我仰头望了望母亲，怯生生地说：

“妈妈，我怕！”

母亲没回答我。她拉着我的手继续朝人群深处挤去。

终于，她停下了，努力弯下腰，将我抱起来。我的眼前一下变得开阔。我看见了操场前方的主席台，正中跪着一排人，每个人头上都顶着一只竹篾编织的高帽子，胸前挂着一尺见方的牌子。主席台的两边各站着一排持枪的民兵。旁边的电线杆上有高音喇叭在不停地喧嚷着。我心中的恐惧一点点加深起来，赶紧朝四面看了看，结果没看见一个小孩儿。这是大人的世界，不是我呆的地方！我立刻想到了逃跑，就像一只遇上狼群的小羊本能地觉察到了危险的逼近。但此刻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人群。我感觉自己比一只蚂蚁还要小，随时都可能被某位大人踩得粉身碎骨。我恨不得像鸟儿一样生出翅膀，飞离这阴森的人群，可是我只能用双手紧紧抓住母亲的肩膀。我把目光停留在母亲脸上，再次怯生生地说：

“妈妈，我好怕……”

母亲依然没说话，只是拍了拍我的屁股，把我抱得更紧了。当时我想，只要母亲不把我放下，我也许就不会被踩死。

不一会儿，人群骚动起来，我的耳边仿佛有一大群马蜂在嗡嗡地响着。这时台上忽然窜出几个人；威风凛凛地把前台跪



着的每个人的脖子往下按了按。于是那些跪着的人把头埋得更低了，只是头上的竹篾帽依旧笔直地立着。隔了一会儿，又有几个人被押上台，每个人都被身后的民兵反剪着双手。接着，高音喇叭开始吼了起来，是一长串犯人的名单。每念到一个名字，便有一个人被套上绳索五花大绑起来。当刚押上台的几个犯人捆绑完毕之后，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坐到了台中央的麦克风前开始讲话。我听不懂他到底说了些啥，只觉得他说的一切是那样神秘而遥远，令我望而生畏。高音喇叭瓮声瓮气地一阵阵撞击着我的耳鼓，仿佛预示着有一场战争就要向我袭来。我感觉自己很快就将挺不住了，可是母亲依然没有离开的意思。好不容易，终于捱到领导讲话完毕，这时却又从旁边杀出一个人来，冲到台中央，右手握拳高高举过头顶。一阵阵嘶哑而揪人心魄的呐喊便从他那努力咧开的嘴里窜了出来。他每喊一句，台下的人也跟着举起手臂呼一句。我看见无数只手臂突然间举起又放下，那场面真是壮观无比。口号喊完之后，人群终于开始散场。母亲抱着我，随着人流慢慢退到场边的一角，然后将我放下。看着渐渐消散的人群，我心头的紧张与恐惧也渐渐退去，就问母亲：

“妈妈，我们为啥还不走？”

“等你外婆。”

“外婆在哪儿？”

正疑惑之际，母亲捏了捏我的手，说：

“快叫外婆。”

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这位正朝我们走来的老太婆竟然是我的外婆。只见她胸前挂着一块一尺见方的牌子，上面写着几个粗黑的大字，头上顶着一顶又高又尖的竹篾帽子，弓腰驼背，步履蹒跚。母亲走上前去，叫了一声：

“娘……”

“先帮我把帽子取下来。”

外婆蹲了下去。母亲双手捧住竹箴帽，慢慢往上提。帽子在外婆头上却岿然不动。母亲低头问外婆：

“娘，疼吗？”

“不怕，用点劲儿！”

母亲咬咬牙，双手死死抱住帽子猛地往上一提，竹箴帽终于被取了下来。母亲把竹箴帽扔在地上，随着“咚”的一声沉响，一些泥土和石块从竹箴帽里散落出来。母亲轻轻骂了一句：

“这些不要天良的，不断子绝孙才怪！”

外婆站起身来时，我看见她额头上有一道长长的血口子，鲜红的血痕正像一只蚯蚓直往她眼角爬去。我心里一阵发紧，忍不住使劲喊了一声：

“妈，外婆头上有血！”

然后就放声痛哭起来……

④

于是，外婆额头上那道鲜艳的血痕便成了我童年最闪亮的记忆之一。时至今日，每当我看见流血的伤口，便会想起我的外婆，想起我记忆中的第一滴血。后来据母亲讲，我所见到的场面仅仅是在逮捕犯人时让地主富农陪陪场而已，前些年挨批斗时，外婆可惨多了。如今忆起，有时我也觉得，我和我的同龄人都是最幸运的一代。我们赶上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大革命，成为荒诞历史的亲历者，而又不至于像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那样受太多的苦。文革之后出生的人是幸福的一代，但不是幸运的一代。他们只能从历史教科书或大人的话语碎片中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。



自从见了外婆被批斗之后，我的心情曾长时间地郁暗下来。我一次次问母亲，外婆是坏人吗？母亲每次都毫不迟疑地告诉我，外婆是好人。我相信母亲没有撒谎，因为生产队里有几位我不喜欢的阿姨也曾对我说过，外婆真是个好人的。我不明白好人为什么偏要受罪，不禁渐渐担心起来。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将来到底该做好人还是坏人。就在我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担心不已之际，更深的忧虑又从天而降。197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大我一岁的堂姐来我家作客。她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，你知道吗，人都是要死的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呆了，赶紧问她：

“我们也要死吗？”

“当然啦，连毛主席都……”

“都怎么啦？”

“都……都逝世了。”

“逝世……什么叫逝世？”

“逝世……就是死的另一种说法。”

我一下子糊涂了。那些天我刚刚认识了无处不在的“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”几个字，毛主席怎么会……

“就算活一万岁，最终也是要……逝世的。”

堂姐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我说道。

我的心一下子坠入了万丈深渊，四周是无边无际的黑暗。绝望和恐惧将我紧紧攫住，我感觉自己似乎马上就要从这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……

许多年后，我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秋日的下午，回忆起领袖逝世带给我的无边的恐惧。那是我第一次明白每个人都

是要死的。从那以后，我总担心自己一觉睡去就不再醒来。

后来从书上得知，1976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。虽然这些事件对我的命运肯定有一些影响，但我依然觉得离我很遥远。对我个人来说，1976年最重大的事件，是我从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中，知道了每个人（包括我自己）都会终老（死亡）的事实。

阴郁的1976渐渐远去，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，1977年的春节终于来到。啊，春节真好，大人小孩的脸上都无一例外地洋溢着开心的笑容。桌上的菜肴出奇的丰盛，我只嫌自己的肚皮太小，不一会儿就撑着了。可是春节为什么那么短呢？在小孩们还意犹未尽之际，大人们便又板起了面孔，每次吃饭时桌上又只剩下一碗泡菜。我开始讨厌起大人来，他们一定把好吃的都藏起来了！之后每顿吃饭时，我都暗暗留意他们吃了些什么，结果发现除了我的小碗里是米饭之外，他们都喝着见不着米粒的稀粥。一天中午，母亲收工回来，没有烧火做饭，而是坐在凳子上发愣。我走上前去，对母亲说：

“妈妈，我饿。”

母亲一把搂住我，放声痛哭起来。

“儿啊，家里一粒米也没有了，我们上哪儿去吃饭呀？”

我不知道米都到哪儿去了，它们是害怕被吃都藏起来了吗？但我没敢问母亲。从那天起，我发现肚子一天比一天饿得厉害。有时摸着肚皮，感觉里面只剩下了肠子。终于，有一天我看见父母在偷偷地吃着什么，愤怒从我心头陡然升起：原来他们想饿死我！我没吭声，而是悄悄地注意着他们的行动。最后我清楚地看见母亲把一只碗放进了柜子。等他们出工之后，我急忙端来一条凳子，放在柜前，爬上去，打开了盖子。我一眼就看见了那只碗，碗里面躺着三个拳头大小的馍馍。我赶紧



抓了一个，盖上柜子后匆匆逃到了屋后的山坡上。在确信没有人发现我后，我掏出馍馍，猛地咬了一口。一股苦涩的味道迅速塞满了我的嘴——这馍馍原来是糠做的！我大失所望，但还是想学着大人的样子咽下去，填充一下早已空空如也的肚子。可是我稚嫩的喉咙怎么也容不下那粗糙的糠粒。

就这样，关于饥饿的记忆从此深深地刻入了我的脑海。也许，1977年算不上中国的饥荒年份，可我总觉得那年我是全中国饿得最厉害的一个。每当想起1977，我的嘴里便弥漫起一股苦涩的糠粒的味道。

1977年，我随母亲走的亲戚特别多，以致我都怀疑，我们家咋会突然冒出那么多的亲戚。据母亲后来讲，那是为了蹭饭吃。有一家亲戚在镇上，吃商品粮的，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阔气的人家。他们家有一对大我将近两岁的双胞胎女儿，长得异常可爱。她俩似乎特别欢迎我，给了我好几颗糖吃。我小心翼翼地吧糖含在嘴里，巴不得它永远不要化去。突然，双胞胎姐妹凑近我的耳边，悄悄问道：

“想吃饼干吗？”

那时我还不知饼干为何物，但猜想饼干一定和糖一样好吃，便毫不犹豫地地点了点头。

“那你跟我们出来吧！”

我不假思索地跟着双胞胎姐妹出了门。她俩把我带到河边的树林里，然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道：

“只要你在我们面前撒尿，这块饼干就归你。”

说着，还晃了晃手中那块圆溜溜的东西。我心想，这还不容易吗？何况我也正想撒尿呢。于是我利索地褪下裤子，面向河面，稍一运气，一股小水柱便从双腿间冒出老高，冲向河面，溅起一团晶莹的水花。

“姐姐你看，他的鸡鸡……”

我从姐姐手中拿过饼干，骄傲地穿上裤子。没想到一泡尿竟换来了我平生的第一块饼干！这时双胞胎姐姐又凑近我的耳朵，神秘地对我说：

“你到一边去，我们也要撒尿！”

你们撒尿为啥要我躲开？我一边纳闷，一边退后几步。姐妹俩便在我的不远处提着裙子蹲下去。当我的目光触及她们双腿间的时候，我一下子糊涂了：没有鸡鸡怎么撒尿？这时我听见其中一个说：

“他盯着我就撒不出来。”

“我也撒不出来。”

我心头不觉有些委屈。这怎么能怪我呢？连鸡鸡都没长，当然不能撒尿了！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每当我看见女孩子，总是隐隐替她们担忧。

关于1977，还有一些记忆的碎片，就像河流中的水花偶尔泛起。比如从大人们口头或刷写在墙上的标语那儿，我记住了“打倒四人帮，人民喜洋洋”一句。还有一句在小朋友中流传的童谣：华主席上台，我买了一双新草鞋。我问大人，华主席是谁？大人说是我们的“皇帝”。我又问，华主席离我们有多远？大人回答，在北京。北京有多远？大人们哑然。那时别说生产队，就是全大队两千多号人中，也没有谁到过北京。1996年我第一次到北京，西站下车时，浮现在脑海里的第一个词语竟然是——华主席！

童年时光无声无息地流淌，生命的感受在一天一天地增加。当大人们在生产队的田间地头劳作之际，我常常独自一人



坐在半山腰的茅草屋前，望着天空发呆。童年的记忆里似乎大多是些阳光灿烂的日子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对阳光产生了浓烈的兴趣。我想弄清阳光为何物？为什么不能把它关进我家黑魑魑的屋子？我曾长时间目不转睛地盯着太阳，发现它原来在天空中飞速地旋转，终于明白了太阳为何东升西落。我还曾用一支空瓶子对着从屋顶漏进的光线，希望瓶子里能装满光明，以替代晚上昏暗的煤油灯。茅屋东边一百多米处有一股小小的山泉，一年四季不停地流出清凉的泉水。离泉眼不远处有一口一米见方的水坑，这便是我家的水井。口渴时我会独自来到井边，俯下身子就能喝上甘冽的井水。有时候我反复端详着水里那张稚气而迷惘的脸，总想不起自己怎样就来到了这个世界。我不知道自己还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大，长大后还活多久才会死去。

我喜欢夏天的日子。山前屋后一派蓊蓊郁郁，各种各样的昆虫又回到了这个世界。屋后的刺树上常常可以捉到一种会飞的甲虫，用线系了后腿，使劲一甩，它便绕着你的手指一圈又一圈地飞起来。捉蜻蜓就更好玩了。蜻蜓分两种，一种昼行夜伏，一种夜行昼伏。夜晚在院坝乘凉时，借着月光，可以看见许多蜻蜓在低低地飞，瞅准了，一扇子挥去，便可将其打昏在地。这种蜻蜓虽然体型较大，但颜色单调，呈暗青色，我不喜欢。白天看见的蜻蜓可谓五彩缤纷。有红的、黄的、青的，还有花白的……我最喜欢红色的蜻蜓，其次是黄的，但这两种都较少，成为蜻蜓中最鲜艳的点缀。我常常以为红蜻蜓就是国王，黄蜻蜓则是国王的妻子。最好看的是蜻蜓打架（后来从书上得知那叫交尾）。两只蜻蜓在空中打来打去，后面一只突然咬住前面一只的尾部，再把尾巴卷至前一只的胸部，两只蜻蜓便连在一起，像一架飞机平稳地向高处飞去。捉蜻蜓的最好

办法是用竹扒（一种用竹子制成的农具）网上一层厚厚的蜘蛛丝，从后面悄悄靠近，一把罩上去。蜻蜓的翅膀极薄，一粘住蛛丝便逃不掉了。把蜻蜓肢解后便可喂蚂蚁。在地上随便找一只蚂蚁，放在它跟前，蚂蚁上前嗅嗅，便用嘴咬住往家里拖，拖不动时就回去搬援兵。跟踪它就可以找到蚂蚁的老窝。这只蚂蚁一路匆匆地往回赶，一直赶到家门口，和别的蚂蚁一个劲儿地碰头交流。不一会儿，一大队蚂蚁便朝着目标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。还有一种玩法可以让蚂蚁坐飞机。捉一只蜻蜓，不把它弄死，而是用小石块压住它的翅膀，等密密麻麻的蚂蚁爬满蜻蜓全身时再突然把石块移开，蜻蜓就会载着蚂蚁一下子飞向天空。有时候玩得不耐烦了，一泡尿对着蚁穴冲去。一窝蚂蚁便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转瞬间成了溃不成军的灾民。玩蜻蜓和蚂蚁是童年的最大爱好。被我捉住的蜻蜓少说也能装满一麻袋。上学后才得知蜻蜓吃蚊子，属益虫。为此我心头不安了许久。

最令我有成就感的是到山脚的小溪沟里捉鱼。当溪水齐膝深的时候（水深了大人是不许我们下水的），我便可以和其他几个孩子一起，脱得光溜溜的下水摸鱼。溪沟里的鱼不少，但也不大，多藏在草丛或石缝里。捉鱼时双手张开，从两边往中间缓缓合拢，碰到鱼便能一把抓住。将捉来的鱼用一草茎通过鱼的腮和嘴串起，再系上一根树枝插在岸边，鱼儿便像上了绳的牛，怎么也逃不掉了。运气好时一上午能捉到五六条二指来宽的鲫鱼。提回家后，撒上少许盐，用菜叶包了，往灶堂的火堆里一放，几分钟后就可吃到美味的鲜鱼。还有一种捉鱼的方法须得在大雨过后。当洪水从梯田的缺口处一级级冲下时，在缺口处安上一块较大的竹篾巴，水流一冲上篾巴就迅速漏下，留下鱼儿在上面活蹦乱跳。每逢这种时候，连大人们都是要出



动的，小孩子便左蹦右跳地打下手。收获自然也很大，半天时间一般都有两三斤。黄昏时分，当炊烟四下飘散，村子里到处都弥漫着一股令人垂涎欲滴的鱼香味。只可惜后来大量使用化肥，田里除了泥鳅之外，其他鱼种都已绝迹。大雨过后，洪水依然一级级冲下，却再也看不到捉鱼人的影子了。

1978年夏天的一个黄昏，夕阳正一点点向西山靠去，大地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辉。我坐在山坡的小路上，等着父母收工回家。忽然，外婆的身影远远地出现在了 my 视野里。我立刻像一只欢快的猴子一跃而起，向外婆奔去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自己吃过的所有好吃的东西都与外婆有关。而这次，外婆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好吃的东西，也带来了令我兴奋不已的消息。那天夜里，外婆和父母议论了很久，大致是说现在念书不再讲成份了，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的子女都一样对待。我听见他们说：

“平儿将来也可以考学或当兵了，总算有盼头了。”

最后，母亲搂着我，含着眼泪对我说：

“平儿，你一定要好好念书，为我们争气啊！”

我有些茫然地望着母亲，使劲点了点头。从此，上学念书就成了我心中最神圣的事。

就这样，我那阳光灿烂却不乏饥饿与忧郁的童年生活渐渐走到了尽头。一条新的朦朦胧胧的人生道路呈现在我的眼前。我不知道那是一条怎样的路，内心充满了莫名的憧憬与期待；我不知道自己最幸福最纯洁的人生时光正在一点点儿远去，各种坎坷与艰辛将扑面而来。在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，我一次次在梦里回到自己的童年。那熟悉的山坡小道、阳光流泉竟成

为我生命中最深刻的印痕。无论幸福与痛苦、欢乐与惆怅，似乎都与童年的某段心理感受遥相呼应。今天，每当看到身边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，我总是在想，他们绝非因为年幼就愚昧无知。也许，他们今天体验到的一切，将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部分。

在热切的期盼中，我终于等来了开学的一天。生命中新的一页就此翻开，从此我开始了十九年的求学生涯。1978 于是成了我人生旅程上最醒目的标记之一。

大队小学和我家隔着不大不小两座山，一共有五里路程。途中除了一小段马路和一座十多米长的石板桥外，其余的都是些田间小路，路的两边是一块接一块的庄稼地。生产队里与我同班的还有另外三名小伙伴：刘兵、李建华和余小英。余小英的爸是生产队长，但她老是挂着两串鼻涕，不时“呼哧”的一声吸一下，让人觉得与她爸爸的身份极不协调。刘兵的爷爷很会讲故事。听大人们说，他曾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过兵，在淮海战役中还被人民解放军的子弹击穿了腿部。李建华没有母亲，据说前几年饿得慌的时候悄悄跑到福建去又嫁了人。我们的老师名叫杨洁，是一位二十六七的女老师，长得很美，浑身上下干干净净，纤尘不染，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。杨老师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女儿，名叫杨晓晓。晓晓只有五岁，却能背诵好多古诗。她们母女俩就住在我们教室隔壁的一间屋子里。寝室门开着的时候，可以清楚地看见屋里有一张总是很整洁的床和一只三脚炉子。晓晓也和我们一起上课。她在班上年龄最小，是惟一穿裙子的学生。令我受宠若惊的是，我和晓晓竟成了同桌。但我却不敢和她说话，甚至连正眼看她一眼也会感到心